

马恩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概述(二)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胡永钦 耿睿勤 袁廷恒

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 人民出版社和“马克思全书”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又促使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趋成熟。1921年7月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经过酝酿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从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始有领导、有系统、有计划地被译介到中国来。在党中央领导机构建立之后，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除继续编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新青年》作为党的公开刊物，《共产党》月刊作为党内秘密刊物之外，便着手组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和出版工作。1921年9月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11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里提出：“中央宣传部在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人民出版社设在上海成都南路辅德里625号（今30号）由当时担任党中央宣传主任的李达亲自主持，并兼任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为了避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搜查和迫害，便于在上海秘密出版发行，在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书刊上，印有“广州人民出版社”字样，社址印为“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

人民出版社主要是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和翻译著述。它在一項通告里阐明了它的宗旨。“近年来新主义和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

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

这项通告还公布了该社的出版计划，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十五种。计有《马克思传》（王仁编）、《工钱劳动与资本》（袁让译）、《价值价格与利润》（李定译）、《哥达纲领批评》（李立译）、《共产党宣言》（陈佛突译）、《法兰西内乱》（孔剑明译）、《资本论》（李漱石译）、《剩余价值论》（刘英译）、《经济学批判》（李漱石译）、《革命与反革命》（李漱石译）、《自由贸易论》（吴智译）、《神圣家族》（钱润译）、《哲学之贫困》（黄式遵译）、《犹太人问题》（胡琰译）、《历史法学派之哲学的宣言》（张思九译）。“列宁全书”有《列宁传》、《国家与革命》等十四种。这两套马列经典著作丛书共有二十九种，此外还有“康民尼斯特丛书”。

十一种，其他理论书籍九种，其中包括恩格斯的《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

从计划出版的“马克思全书”的书目来看，除《马克思》传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十四种，其中马克思著作十一种，恩格斯著作一种，马克思、恩格斯合著两种，包括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既有马克思、恩格斯成熟时期的著作，也有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可见，编者的意图是想通过出版“马克思全书”使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全貌有一个系统的了解。遗憾的是，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和物质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全书”的出版计划未能完全实现。实际只出版了三种：《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和《马克思资本论入门》，而只有前两种是马克思原著，后一种是李汉俊翻译马尔西著的介绍《资本论》的通俗小册子。作为“马克思全书”第一种的《共产党宣言》是重印陈望道的译本，译者署名改为陈佛突。《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是第一次以单行本出版的另外一个新译本。1919年《晨报》曾发表过食力的译文，是从日文译的。这次的单行本是袁让根据恩格斯校订过的1891年的德文版翻译的。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和表达红色革命的意图，封面的书名用套红印刷。

党成立后，立即决定以丛书的形式集中地大量地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小册子，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并把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纳入党的正常工作，而且一开始把它同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是实用以启发和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指导工人阶级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重要理论武器。与此同时，党的机关

刊物《响导》和理论刊物《新青年》以及其他一些进步刊物，如《少年》、《先驱》、《青年周刊》、《前锋》等都陆续地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活动的文章。如陈独秀在《新青年》1922年7月第9卷第6号上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一文，文章在介绍马克思的学说时，引译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的论述，并介绍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哲学的贫困》等著作的内容。再如邓中夏在1922年1月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创刊号上，以重远笔名发表题为《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援引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部分论述。

纪念马克思、宣传马克思、 学习马克思

在这段时间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纪念马克思的活动也广泛开展起来。1922年5月5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生一百零四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全国各地党、团组织和进步团体都纷纷开展纪念活动，如召开纪念会、举行演讲会和讨论会，出版纪念专刊或发表纪念文章等，掀起了一个自从中国人知道马克思及其学说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纪念和宣传马克思的活动。5月5日这一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根据党的决定，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同时，还专门编辑出版了《马克思纪念册》。这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一个马克思纪念册。纪念册封面套红印有马克思的半身像。纪念册包括三篇文章：第一篇《马克思诞生一百零四周年纪念日敬告工人与学生》，号召学习“马克思做一个苦战奋斗的战士”；第二篇是节译威廉·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传》，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其事业；第三篇《马克思学

说》，简要叙述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这本纪念册广为散发，正如陈独秀在给共产党国际的报告中所说：“五月五日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召开马克思纪念会，分散马克思纪念册两万册”，足见其影响之大。在北京，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北京《晨报》副刊出版了“马克思纪念专号”，刊载了四篇介绍马克思生平和学说的文章。北京《今日》杂志出版了“马克斯特号”，并在中山公园举行纪念演讲会。同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省委员会，为了表示对马克思的崇敬，特选定马克思逝世纪念日——3月14日，召开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会上确定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为宗旨。青年团广东省委员会机关刊物《青年周刊》为此还发表了纪念马克思的专文。

1923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先驱》发表了题为《马克思诞生一百零五周年纪念日敬告中国青年》，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武器”，号召中国青年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同帝国主义、军阀势力展开斗争。同年5月5日影响较大的北京《晨报》出版了纪念特刊。天津《新民意报》副刊《星火》也发表了《马克斯传》和李大钊在1922年所做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演讲的文稿。这些纪念性活动，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工人、革命青年对革命领袖的怀念和崇敬的心情，同时也表达了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决心。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纪念马克思活动的广泛开展，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学习、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也越来越多。正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估计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是很短的，至今不过三年左右。可是一面因为受了国际

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他一面因为先驱者的努力宣传，竟使马克思主义能在最短期间发达起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多起来。”

1922年底天津一些革命青年组织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学说的“马氏学会”。该学会于1923年1月在《新民意报》上创办了副刊《明日》。它是该报副刊中“唯一专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刊物”。他们还创办了一个“马氏通信图书馆”，专门出借中文和外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让更多的人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图书馆的成立宣言说：“我们的目标是马克斯主义，因为我们相信马氏学说是改造社会唯一的工具，所以情愿受了马氏的洗礼，来作马氏的信徒。我们更相信改造社会不是少数人能办的事，所以便把我们的工具——马氏底书籍——来供大家，组织这个马氏图书馆。”图书馆分中文、日文、英文三个部。在公布的中文书目中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李汉俊译的《马氏资本论入门》、袁让译的《工钱劳动与资本》，以及《马克思纪念册》等等。这些活动扩大了马克思学说在天津，特别是在青年中的影响。

1923年，毛泽东等人为了发展湖南地区的革命形势，加强对党团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团结社会进步人士，扩大革命力量，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聘请了李达讲授马克思学说并主编该校校刊时《新代》月刊。为了使学员和广大群众能直接学习马克思著作，李达翻译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全文，刊登在《新时代》1923年4月出版的创刊号上，当时的译名是《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这是《哥达纲领批判》在我国发表的第二篇中译文。（1922年《今日》杂志曾有过译载）此外，该刊还发表了毛泽东、李维汉等人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译述在湖南湖北等地产生很大影响。

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的进步

报刊刊登译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也日益增多起来，甚至某些有影响的书局和一些非进步的报刊，也出版和刊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文。1922年10月，当时中国最大的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季翻译的《价值价格及利润》（即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单行本就是一例。该译著的校阅者陶孟和在序言中明确表示，他们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现在读马克斯主义的人非常之多，相信马克斯主义的人——至少在知识界中——大概也不少。近几年来，国内的杂志报纸对于马克斯的学说尝尽量的介绍研究。讨论马克斯的学说或他种社会主义差不多已经变为一种时髦的标志。”所以，他们才不得不出版一两本马克思的著作，以迎合时代的潮流，见好于读者。

在这个时期，译载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有关的文章比较多的是1922年2月在北京创刊的《今日》。该杂志在第1卷第4期的“马克思特号”卷头语中说：“本志是研究马克斯学说的机关，差不多每期都有他学说的文章……，因为马克斯对于学术上思想上社会改造上都有很大贡献。”《今日》从第1卷第1期到第3卷第2期，共出版了10期。从第1卷第2期起陆续刊载一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及有关的译述。其中1922年5月出版的第1卷第4期是“马克思特号”专门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和生平。“逢着本年五月五日，他百零四周年之祭日……专载关于他的学说的几篇文章，以表示一种微忱的纪念。”在“特号”中，刊载了熊得山译的《哥达纲领批判》（《哥达纲领批判》）的全译文，包括马克思1875年5月5日写给白拉克的信，并附有《德国社会主义劳动党哥达纲领》全译文。这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在我国发表的最早的中译文。该译文还在1923年5月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义出版了单行本。此外，这一期还刊登了湖南湖的《马

克思传》，对马克思的生平和马克思的几种主要著作作了简述，发表了李湘渔女士翻译的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三首诗和李光华女士的《马克思夫人燕妮传》等文。该刊从1922年3—5月出版的第1卷第2期到第4期连载了邝摩汉译述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至第五篇的部分内容。标题分别为《绝对剩余价值研究》、《相对剩余价值研究》和《绝对的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在1923年8月出版的第3卷第2期上，刊载了熊得山译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第一章（标题为《历史以前的文化阶级》）、第五、六章（标题为《国家的起源》）和第九章（标题为《未开与文明》）的译文。此外，1922年7月出版的第2卷第1期上还发表了《马克思著作史》，列举了马克思从1842—1875年间撰写的包括《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十八种著作，并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今日》虽然不是进步刊物，它的编者和一些撰稿者写过许多观点错误，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是它这个时期所译载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介绍马克思的文章，客观上对当时渴望阅读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具有一定的作用。

这个时期，远在法国勤工俭学学生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为了在留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也为了同流行于学生和华工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创办了《少年》。围绕这个目的，周恩来等人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批驳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同时还发表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在1923年7月1日出版的《少年》第10号上，以《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为题，摘译了马克思1852年3月5日写给魏德迈的信中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著名论断。译者署名石人。同一号，还发表了抱今译的马克思的

《政治冷淡主义》（原译名《离开政治的性质》）的全译文。在第13号上，又以《权力的原理》为题发表了恩格斯的《论权威》的全译文。不难看出，这三篇文章主要是为批判无政府主义而选译的。这些译述对在学生和华工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起了很大作用。还应当指出，这几篇译文，是党成立后在国外翻译出版的第一批中译文，也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史上值得记载的一页。

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一个 新发行网的建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全国各地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工人阶级与其他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大的敌人。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帮助下，实现了国共合作，建立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从而加速了革命步伐，出现了北伐革命的高潮。革命形势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时，党为了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于1923年11月又成立党的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专门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等革命书刊和印行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为了避免反动当局的注意，转移敌人的视线，上海书店还销售民智书局、新文化书社、亚东图书馆以及商务印书馆等单位的出版物。1925年，随着革命形势好转，为了满足各地对上海书店出版物的需要，上海书店又建立了自己的印刷所。接着又在各地建立发行机关，如长沙文化书社、湘潭书店、南昌明星书店、广州国光书店、潮州韩江书店、太原明星书店、安庆新皖书店、青岛书店、重庆新署书店、宁波书店、海参威五一书店。此外，巴黎有一个书报社，香港有一个代售处，销售上海书店的出版物。这样，就形成以上海书店为中心的销售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报的发行网。

上海书店从1923年成立至1926年遭封闭为止的三年中，除印制发行如《响导》等党的刊物和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读物以及一批社会科学书籍以外，还重印发行了一些如陈晓风（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于1925年出版《哥达纲领批判》的另一种译本。这部著作的出版配合了国共合作后的新形势和党的宣传工作，该著作是由柯柏年在潮州翻译的，为了保证译文质量和帮助读者阅读，译者翻译时，对照了三种英译文，并在难懂地方加了注释。他译完之后，寄给上海书店出版。为了及时出版，译者自己出资于1925年8月由上海书店作为“解放丛书”第一种在上海出版，译者署名李春藩，印数两千册。这个译本是当时已出版的几个译本中最完整的译本。本书除了正文和马克思1875年写给白拉克的信外，还收入了恩格斯1891年写的《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序言》。该译本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几个月之后，即1926年1月又重印了第二版。在这之前，柯柏年还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据译者回忆：当时许多人都对社会主义的问题感兴趣，而恩格斯的这部重要著作在社会上流传的1920年郑次川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小册子，只节译了第三章，而且译文错误甚多。所以他决定把这部重要著作全文译出介绍给读者。编者在发表时加的按语中说：“这是社会主义的三大经典之一，为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所必读之书，亦为最易明了社会主义要领的入门书。全书共三章，第三章曾由某书局翻译出版，可惜译得不甚高明。此系全译，译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又素有研究，故意义和文字都较前者为善。”这部著作，译者是1924年在北京翻译的，于1925年2月至3月以丽英女士的笔名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载。标题是《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柯柏年的译文是恩格斯这部著

作在我国发表的第一篇全译文。也是在这个时期，柯柏年在汕头《岭东民国日报》副刊《革命》当编辑的时候，曾翻译了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时期写的《六月革命》，也以李春藩名字发表在该报副刊1926年第3卷第4期上。译名是《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无产阶级之失败》。

此外，1925年，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从5月9日至5月12日和15月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另一种译文，译者彭学沛。他是根据德文和法文本翻译的，并介绍了《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过程。这样，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前后共有四种中译文了。

国共合作后，北方的革命运动也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北方委员会为了使广大革命群众和无产阶级更了解党提出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党的机关报《政治生活》于1924年8月24日以《民主革命与工人》为题，译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写的阐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原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的片断，译者署名葵。《政治生活》的编者在译文前加的按语说明了发表译文的意图。按语说：“这篇演说与《共产党宣言》同一重要，所言方法在六十余年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采用，已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至于我们今译此演说的意思是在：（一）希望工人阶级明白了解对国民革命的责任，不要盲从中等阶级的主张，（二）揭发中产阶级易与旧统治阶级妥协的性质，使中国平民注意监督民主主义者，不要背弃了他们的利益。”1926年《政治生活》第76期又发表了李大钊翻译的（笔名猎夫）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标题《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关于中国问题的二十多篇文章中的第一篇中译文。李大钊介绍说：“马克思批评当代历史事实的论文，是无产阶级研究马克思的人们绝好的材料的宝藏，我们

要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就中国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寻求一个显明的分析，最好是一读马克思当时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尤其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普遍全国，英国发生空前未有的大罢工的今日。”我们知道，《政治生活》是中共北京地委和北方区委的机关报，印量多，影响大，而它们登载的译文又同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因此对北方革命活动起着很大的指导作用。

除了上面叙述的各地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之外，这几年，各地报刊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更多了。特别是通过纪念革命导师的形式，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更为广泛。例如，1925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了“五月第一周特刊”。其中刊载了任弼时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零七周年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概略》一文，通俗而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由来，唯物主义辩证法和阶级斗争学说，并号召青年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说：“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去研究一切学问，方才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解答。”该刊为了帮助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的学说，还在第24期上发表了一个学习书目，并对每一本著作作了简介。书目中所列举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有：《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等。北方党的《政治生活》也发表过纪念性的社论，指出在国民革命中的中国无产阶级，不可忘记马克思主义原理。北京大学的《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在1924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六周年出版了“马克斯纪念专号”，发表了《马克斯年谱及其著作》等四篇文章。在《马克斯年谱及其著作》中，作者介绍了马克思生平活动，并列举了马克思著作八种，学习马克思学说的参考书十七种。在此之前，1923年11—12月即第15、16号上连载了《马克斯小传》。此外，1926年一些地区还

（下转第28页）

革命青年向科学大进军，——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八次代表大第会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64—66页。

必须发展当地的民族学校、民族剧院、民族教育机关，提高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因为几乎用不着证明，愚昧无知是苏维埃政权最危险的敌人。

斯大林：《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17页。

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开展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老一代和教育新一代的工作。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和偏见是

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这些传统和习气控制着千百万劳动群众，它们有时笼罩着无产阶级各阶层，有时给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造成极大的危险。因此，同这些传统和习气作斗争，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必须克服这些传统和习气，并且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新一代，——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不执行这些任务，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斯大林：《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17页。

（续完）

（原载《理论动态》第336期）

（上接第34页）

举行了纪念巴黎公社四十五周年的活动。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还成立了纪念巴黎公社筹备会，出版了《巴黎公社纪念册》，《新青年》也发表了纪念文章。

综上所述，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译文的种数，还是介绍和宣传马克

思主义的文章都比之党成立以前显著增多。这几年中，仅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新发表的中译文就有十五种。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为此作了巨大的努力。由于党的领导和推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更广泛的传播打下了基础。

